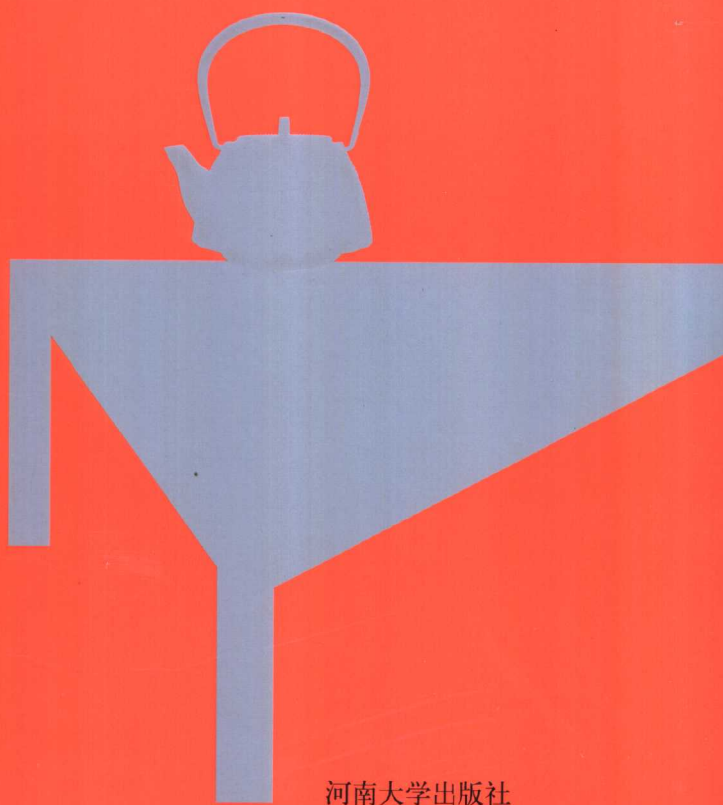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后现代主义

主编 陈晓明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后现代主义

主编 陈晓明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陈晓明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9

(新思潮文档/金惠敏主编)

ISBN 7-81091-085-X

I. 后… II. 陈… III. 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文集
IV. I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282 号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责任校对 靳路遥

责任印制 苗 卉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7-81091-085-X/I·200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金惠敏

总 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相对于“文革”的“新时期”，那确乎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峥嵘岁月。不过今天从思想史或者思想创新的角度看，“新时期”之“新”似乎仅具有拨乱“返”正的意义，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远承“五四”精神，近接 50 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关注的主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性、异化、马克思手稿、美的本质、现实主义等等，均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时而低抑、时而高亢的老话题，而且，“左”、“右”对垒，阵线分明。“右”者坚信只要冲破“左”的禁锢，前景就是一片光明；而“左”者则认定，“右”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动乱、无序和资本主义复辟。那时的“思想解放”其实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解放，要么就仍然禁锢着。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对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单纯而幼稚、激情而盲目，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

进入 90 年代，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当我们感觉“新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思想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思维创新的佳境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它总是晦暗不明，难分难解，相互渗透，多种可能性并存。具体说，90 年代的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它呈现出思想作为一

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来,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家、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传媒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题为其语境。

但是如果将思想还原为现实,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思想界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传统发扬光大,如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让传统自己说话,而在中国则除了这层任务之外,更加之以如何与西方这个“他者”相对话。“传统”与“他者”可能就是当今最大的哲学问题。

将这些 90 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熟或者完成使命。应该承认,这些思想还嫌稚嫩,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定论。但是,它们是我们走过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更蕴涵着无限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那么这些文本之作为历史资料的参照意义甚或作为思想地图的指示作用将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我者,罪我者,我们一概表示感谢。

惶惶然,谨此为序。

2003 年 8 月 29 日

北京花园村

陈晓明

导 言

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历经十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始终暧昧不清。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但多少还有些堂皇悲壮。因为现代主义搭上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快车,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变革前驱而被渲染的。现代派文学及其思想理论一直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榜样和标本,它所经历的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磨炼,表明它对新旧思想体系都构成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很有限,转化为文学创作成果的就更少见。所谓“’85 新潮”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但现代主义确实构成了一种观念的冲击,它虽然没有有效地建构新的体系,但它瓦解了旧有的秩序。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现代主义当然也显得不伦不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文坛就一度时兴过“伪现代派”的说法,那种揶揄的语调,与 80 年代初对现代派的急切渴望相比,真有一种老谋深算的意味。确实,现代主义并未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扎下根,因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知识积累,在当代中国并未打下基础。现代主义的那种反叛性和超越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状都大相径庭。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主义开创的暧昧场景中登台的,它本身显得更加暧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最初时期,它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的身份。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台相比,它既无天时(需要新思想的历史机遇),又无地利(改革开放形成的文化态势),更无人和(文学界创新的共同愿望)。然而,后现代主义夹着尾巴躲在“现代派”的麾下步入了历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比现代主义晚多少,大陆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词汇的可能是董鼎山,他在《读书》1980年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所谓“后现代派”小说》的文章,但这篇评介性质的短文,是否就是汉语中的“后现代”一词的创造,还难以断言。在台湾,早至70年代末期就有“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是否受到台港的影响,尚不确定,但已经有其在先,大陆就很难争夺这一发明权。在80年代初期介绍现代派的文丛和文章中,就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只不过那时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派。如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其中有不少篇幅选用后期现代主义作品。在该书中,袁可嘉把荒诞派戏剧和法国新小说等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主义”。但袁可嘉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1期)就发表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见袁可嘉的这套文丛付梓较早,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陈焜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1)也多处论述到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现代派艺术特征。他没有使用“后期现代派”的说法。在伍蠡甫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中,也选有法国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阐述文学观念的文章。1984年,何望贤编选《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些问题划在现代派名下,实际上属于后现代范畴。很显然,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黑色幽默”,都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这些选本和文集都没有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

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少量的用“后现代主义”来评介西方文学的新近成果。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听者云集。这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教仪式,传教士本人并不信教。杰姆逊一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但奇怪的是,杰姆逊本人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成长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唐小兵翻译的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使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迅速波及中国各地。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赖于后结构主义打下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虽然与后结构主义经常通用,但它们之间的

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主要限定在哲学与文学理论方面,而前者则更偏向于文学艺术创作、大众文化、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后现代”所指范围要广得多,以至于它经常被视为是包含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更大的具有广义文化意义的概念。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要早一些。80年代初期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就有译介后结构主义的文章。徐崇温在1986年出版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普及读物,在当时的影响不可小视。但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广泛,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也没有令人耳目一新或惊恐不已。但后现代主义不同,不管人们的直接反应如何,它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刺激是非常强烈的。也许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涉及的面更广,它不再只是哲学领域或学术圈子里的事,它与更广泛的文学艺术实践,与理论话语的表达方式,甚至与人们的行为方式、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念相联系。也许有一个现象有些奇怪,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最初传播的时期,它们各自为阵,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大惊小怪与对后结构主义的熟视无睹并行不悖。似乎只有解构主义才与后现代主义沾亲带故。

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其传播面其实并不广泛,只限于少数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80年代后期,在众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中,王宁是最早不遗余力地推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大凡涉及西方的理论思潮,免不了首先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介绍,但王宁似乎怀着更大的肯定性热情加以阐发。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在批判与怀疑的语境中勉强长大的。最早进行后现代主义引介和阐释的研究者其实寥寥无几。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一部分翻译的理论论著才陆续问世。1991年,王宁等翻译出版了由荷兰人佛克马和伯顿斯编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这部书立即受到欢迎。1992年,王岳川与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出版,也引起相当的反响。1993年,刘象愚等翻译出版了哈桑的《后现代的转折》一书。紧接着一系列的国内学者的著作陆续出版,它们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

的后现代性》、《解构的踪迹》(1994),王宁的《多元并生的时代》(1994),赵祖谟主编的《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四卷,1994),以及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伦佑主编和国内数位“后学”研究者编辑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五卷,1995)等等。这些著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较大反响。

关于后现代研究的文章在当时还只是偶尔在主流学术刊物中发表,倒是有几家在学术界并不太知名的刊物成为新生力量。东北沈阳的《艺术广角》一度是“后学”的主要阵地,有关先锋派和前卫艺术的论述占据了这本刊物的主要篇幅,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很少见的,这得力于有眼光的编辑辛晓征。我本人写的《边缘的萎缩:从现代到后现代》于1989年发表于该刊,可以说是较早用后现代理论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趋向的文章。《当代电影》在电影界是举足轻重的刊物,但在学术界并不是热门刊物。《当代电影》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直都是新理论的生产基地,当时的编辑姚晓濛热衷于此道。结构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学说,不断从这个刊物涌现。我本人较早写的《拆除在场: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1990年在该刊发表。那时,很难想像其他的主流刊物会拿出数万字的篇幅发表这类文章。对后现代感兴趣的人似乎集中在文学界和前卫艺术界,栗宪廷、范迪安、尹吉男等人是现代派美术的鼓吹者,他们阐发的现代派的艺术观念,已经非常靠近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栗宪廷后来热衷于阐述的“政治波普”、“无聊现实主义”等等,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据我所知,最早在刊物中办后现代小辑的,倒是美术界的《艺术潮流》。这可能是一本在香港出版和印刷(在内地发行)的刊物,1993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后现代的文章。随后,主流刊物《文艺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都有讨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现象的小辑出现。一些以后现代为主题的会议对后现代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小型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有赵一凡、王宁、盛宁和笔者本人。由于盛宁一直关注后现代问题,由他任主编的《外国文学评论》,也给后现代研究开辟了一方之地。而较有声势的会议当数1993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1994年在西安召开的“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研讨会”等。

在本文的概括描述中,似乎后现代主义在 90 年代初期已经风起云涌,事实上,相比较起远为庞大的主流学术活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界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风雨飘摇中浪迹天涯。如此诗意的表述其实隐含着严酷的学术话语斗争。据王岳川统计,90 年代上半期,发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有近 800 篇。^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质疑、拒斥后现代主义的并不在少数,相当多的文章带着明显偏激的情绪化指责。例如,孙绍振先生就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一个残酷的文化杀手,一头蚕食现代精神价值的怪兽,他断言:后现代的出现“无论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文化灾变”。^②作为孙先生的学生,我深知孙先生的情绪化激愤的后面,还有无边的宽容作为依托。始终站在当代文化前沿的孙绍振先生,不过是对他偶然间错过了一班车发一下牢骚而已。但其他更多的激烈文字,则是要从当代文化秩序整顿与价值建构的高度,对后现代进行批判与抗拒。有学者指出,在当下中国由后现代发动的这场解构运动,“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溃败’与瓦解”,呼吁要“守住那最后的精神家园”。^③在诸多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中,贺奕的批判显得全面而彻底。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精神价值的空疏,他指出:“由于缺乏某种终极价值体系作为依托,这种作用最终将流于短促、狭隘和浅薄,中国后现代论者鼓吹的某些观念,诸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快感,往往包藏着希求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妥协的潜台词,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含着他们推诿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可悲的是,这些观念于他们不仅是文化阐释估价的尺码,更上升为一种与全民刁滑风气相濡染的人生态

① 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② 孙绍振《“后现代”之后》,《小说评论》1994 年第 6 期。

③ 参见张清华《认同或抗拒: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思考》,《文学评论》1995 年第 2 期。或参见张清华《面对后现代:守住那最后的家園》,《文艺报》1993 年 5 月 8 日。

度。”^①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后现代主义定性批判最激烈的言辞。在贺奕的其他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后现代被定性为具有“堕落和反动本质”,不过是中国文化消极面的“全面复辟”。很显然,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者的叙述中已经被妖魔化,加诸后现代身上的那些恶劣品质,诸如反价值标准,反人性,反崇高,不要深度,没有原则,怎么样都行……这些在后现代的表述中都有严格的理论前提和必要的限定,但在批判者这里,这些前提和限定被取消之后,它们从特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孤立出来,然后再被推向了极端。后现代在当代中国就这样被叙述成十恶不赦的妖孽和卑鄙下作的混账。对后现代的批判看上去更像大胆的指控和缺席的审判,批判从来不指名道姓,没有具体的文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例,假想的后果被当成既成事实,毫不留情地栽到后现代的身上。后现代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当代文化的任何一桩丑闻,任何一项罪恶,看不出与后现代的阐释者有任何关系。后现代的言说者,作为一小撮在这个庞大的文化秩序中极为边缘的游走者,何以会令那么多的人怒发冲冠,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对中国后现代的定义充满了歧义和自相矛盾。当后现代派被定义为反动派和破坏者时,那就说明定义者是认同现有的文化秩序的,后现代主义十恶不赦,就在于扰乱了现存的崇高而美满的文化体系;当后现代主义被定义为合谋者时,它到底与谁合谋?那么,在那个崇高美满的秩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有力量的存在物吗?如此看来,那个崇高美满的体系居然可以独立于任何势力而能秩序井然,安然无恙,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那就是思维混乱,或者有意颠倒黑白。

后现代确实危及到真理先天占有者的权力地位,这些批判与反抗的过激化姿态不难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话语的焦虑状态,寻求成为表达言说的中心始终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追求,而以靠近真理的姿态展开言说,则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言说。后现代不过是侥幸成为知识分子失语症自我诊断的一个话题,成为90年代的历史无物之阵中的一个仅有的小小障碍。无的放矢的批判的武器终于有了对象,与其说人们怀着激愤

^① 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讨伐后现代,不如说是带着狂喜进行鞭挞,否则,那么多的形容词与长篇累牍的宣判就变得不可理解了。

后现代就这样从一个稚嫩的小浑蛋,被摔打成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话语生产的永动机。关于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增殖,不管是批判还是申辩,贬斥还是颂扬,它都变得不可拒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好像超越了那段怀疑、犹豫和彷徨的历史,但人们好像突然间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泰然处之的这种接纳并不是出于理论和学理的意义,更多的则是从现实的直接经验出发的。例如,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中国迅速而大规模的城市化,互联网和电信的普及,全球化的影视传媒的影响等等,这些使人们接受后现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长时期以来,我都不太使用“后现代”这个词语,只要能用惯常的词语我就回避那些加上“后”缀的术语。这倒不是因为我怯懦,而是疲惫和麻木。但现在,几乎是突然间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话语空间,不在这个话语平台上言说,已经没有别的去处。例如,现在时髦的“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帝国”等说法,都在后现代的框架之内,至少和后现代沾亲带故。人们现在开始熟练地运用那些词语,那些方法和观念,这也许是一个妥协的极好机遇,人们避免了尴尬,更积极的说法就是达到沟通与理解。谁让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又宽容的时代呢?

实际上,后现代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后现代的言说者和反对者都有多么高远而悲壮的情怀。对于后现代的言说者来说,这不过是知识演绎的必然结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和立场。观念的转化依赖于知识,而不是相反,观念是知识自然而然的延伸。我们总是过于偏执一种观念和立场,以为观念和立场将决定知识的优劣;事实上,只有以知识为依托的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才是真实的距离。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知识孕育的结果。也正因此,后现代的言说者,实在是因为较早触及到了这种知识,因而才会有诸如此类的立场和观念出现。后现代的言说者,既不是什么悲壮的叛逆者,也不是什么下作的合谋者,而只是对一种知识的探寻和热爱,使他们以这种方式存在。

后现代也因为它的舶来品本性而受到质疑,在主张中国文学

批评本土化的人们看来,它的知识身份具有不合法性。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其一,文学理论与批评这门学科就是现代性的一门知识,它本身从基础到概念体系都来自西方,那些早些时候的西方知识已经为中国所用,并被默许为“中国本土化”的了,我以为这种默许因为习以为常而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外来色彩。但这里显然存在双重标准,何以新近的知识就是西方的,就不能用呢?其二,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奏效。其三,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全球化才使本土化成为一个问题和需要,而本土化只能在全球化的格局里才有意义。本土化的诉求本身构成全球化的一部分,离开了全球化,本土化的诉求就显得多余,因而本土化的纯粹性也是可疑的。其四,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与西方相对立的差异性的他者文化。建立一种大国文化,或者说,一种大国文化的新生,无疑是应该最大可能地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中国文化历经了唐代的兼收并蓄,纳百川而归大海,才有了那个时期的博大精深。也许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化也正在经历又一次的文化大融合,最大可能吸取西方文化的成就,才可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时代变得博大深厚而充满活力。这个时期很可能是一百年,二百年,也可能更久。

如此看来,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现在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而感到愧疚不安,再退一步来说,对于寻求知识增长和思想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的民族—国家身份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正是后现代知识的难题。后现代强调差异性,也强化文化身份,但在中国,后现代本身就遭遇到了身份合法性的窘境,而反后现代性的人们,却又正是采用了后现代强调文化差异性的立场。这本身表明,在中国,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人们的立场和言说,总是处在怪圈和悖论的边缘。

本书的选编并不是要为中国后现代塑造某种历史,依然是想把后现代作为一种知识汇集在一起。尽管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夹杂着不少的喧闹,但我不想把这样一种争执的历史作为中国后现代的主要存在形态来处理,因此,本书并未大量收入那些批判性的文字。在我粗糙地浏览这段简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后现代的讨论几乎没有交锋,言说者和批判者之间并没有具体的冲突。

除了个别的批判者之外,绝大多数批判者几乎从来不指名道姓,这可能也给后现代的主张者和言说者的回应带来困难。这既是中国人的情面在作怪,也是近些年的学风造就的古怪心理,因为批判某人很可能造成某人声名鹊起,而抽象的批判则具有捍卫原则和立场的崇高姿态。

基于这种状况,本书只是选取了部分对后现代持批判态度的文章,更多的则是关于后现代正面阐述的文章。为了反映后现代知识的多样性,本书尤为注重过去中国后现代传播过程中较少顾及到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建设的后现代主义;其二是后现代与神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内容,可能最有效地回应了那些对后现代持激烈批判的观点。由此也可见,后现代并不是反人性和反历史的,后现代也并不是一味拆除精神家园,它完全可能是建构,实际上它正是在追求这个时代人们可能的精神家园。尽管说此一后现代非彼一后现代,但它至少表明后现代不是天然地就是破坏的、反动的和堕落的。后现代理应有它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后”的时代,但后现代知识会让我们的时代更生动和富有活力。

2002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金惠敏	总序·····	(1)
陈晓明	导言·····	(1)
王 宁	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 ·····	(1)
陈晓明	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21)
张颐武	论“后乌托邦”话语 ——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向 ·····	(49)
朱立元	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现象”·····	(64)
张清华	面对“后现代”守住那最后的家园·····	(68)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	(72)
王一川	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及其意义·····	(86)
张德祥	“后现代”论:世纪末的理论魔术与文化呓语 ·····	(105)
孙绍振	“后现代”之后·····	(111)
杨 扬	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当代 ·····	(115)
贺 奕	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 ·····	(123)
赵毅衡	“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 ·····	(134)
徐友渔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挑战·····	(147)
杨守森	20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 ·····	(152)
陆建德	海上逐“后”·····	(166)
陶东风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172)
张清华	认同或抗拒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思考·····	(182)
盛 宁	危险的让·鲍德里亚·····	(197)
王治河	别一种后现代主义·····	(204)

周 宪	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	(215)
金惠敏	主体的浮沉与我们的后现代性……	(237)
金惠敏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242)
史 建	90年代中国艺术的后现代倾向 ……	(248)
曾艳兵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诗学……	(257)
卓新平	后现代思潮与神学回应……	(267)
胡全生	拼贴画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运用……	(279)
丁 帆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	(293)
叶舒宪	《哈利·波特》与后现代文化寻根……	(308)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 ……	(319)

王 宁

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争鸣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来，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仅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这场争论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欧美主要批评家和文化及文学研究学者。^①人们从一开始对它持怀疑、排斥甚至不屑的态度，逐步转而开始正视这一泛文化现象和文学艺术思潮，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②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强弩之末、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被新历史主义所替代之态势，一些曾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中作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也不禁发出了“后现代主义终结”的叹息声。^③显然，曾一度居于战后西方文化艺术思潮之主流地位的后现代主义，也将像它的前身——现代主义那样寿终正寝，成为新的经典；它已被学院派批评家当做“过去的一部分——我们无法直接施予影响的部分”^④而加以经验研究，同时也已被载入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⑤这一切均表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然而，令西方学者困惑甚至惊讶的是，就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这股业已衰落了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却在东方文学界和文化界（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它也像当年在西方那样，吸引了作家、批评家、文学艺术研究者、比较文学学者以及范围更广大的读者大众。^⑥

本文就是从文学这一角度切入进而探究的一个尝试。